

龚鹏程 著

国学入门

國學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Z126/17

2007

国学入门

龚鹏程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学入门 / 龚鹏程 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7
ISBN 978-7-301-12483-3

I. 国… II. 龚… III. 国学—基本知识 IV. Z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93945 号

书 名: 国学入门

著作责任者: 龚鹏程 著

责任编辑: 徐文宁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2483-3/Z · 008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pw@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16 印张 286 千字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自序

我写这本书,有些缘故。

一是近年北京、南京、武汉、人民诸大学纷纷开办国学院、国学研究所、国学班、国学营;社会上各类国学讲习机构与活动,更是不计其数,而其实皆乏教材。唯翻印八十年前梁启超、钱穆,或三十年前台湾杜松柏、朱维焕诸先生之作以应时需而已。旧作不废江河,当然该重印;但无论语言、材料、观念,现在似乎总应有一本新的作品才好。

其次是我自己对于做学问,有个基本看法,那就是什么都该由国学传统中发展出来。故国学非一门专业、一个科目,而是各种学问之土壤。这个道理,本不难懂,也绝不会错。但只要一说,立刻就会有无数不知学问为何物的妄人来乱嚷嚷,说是固步自封啦、文化保守主义还魂啦、遗老复辟啦、不能与世界接轨啦、西学才能救中国啦等等等。此辈对中国学问根本未尝究心,固然是不懂的;他们对西方学术之发展,又何尝有所了解?试问:西方学术之发展,难道不是由其文化学术传统中生长起来的?难道竟是切断了来搞,或向中国借来的?

还有些人则不断质疑:国学范围如此浩瀚,皓首尚且不能穷经,想把国学都弄通了,再以此为基础发展出一些东西,怎么可能?

欸!有什么不可能呢?不说别人,我自己就淹贯四部、博涉九流、兼综三教。这些话,听起来像是自夸自炫,其实一点也不。以我之鲁钝,做到这一步,也不过就花了三几年工夫。在我大学时期,便已把国学诸领域大抵摸熟了,掌握了中国学问之大纲大本,此后不过渐次精修,并与西学新学相孚会、相激荡、相印发而已。前辈学者,如康有为、刘师培、章太炎、王国维……,谁不是这样?皆不过二十许岁,于国学皆已通晓,且亦不妨碍其吸收西学。以后因机触会,赓为发皇,工力之积,固然远胜少时,但若说国学非皓首不能究知,则天下没这个道理。

其中关键在于:通晓国学,重点在通。淹贯四部三教九流百家,打通文史哲及社会学科,正是通人之业。通人不是什么都懂,天底下没这种人,更没这种需要。通人只是通达博雅,故在知识与心态上可以通贯地去掌握事理。做学问,精力和时间,大家都是一样的,天资尤其相去不远,可是入门路头不同。为通博之学者,略沉潜,即能致广大而极精微,成为通人。走专家狭士一路者,则

终究只能成为专家狭士。专家狭士,对于自己花了那么多气力才终于在某个领域里稍微有了点知识,既自卑又自负,根本不相信有什么通人竟能在极短的时间里贯通他们那些专业。夏虫不足以语冰,那也是没办法的事。

不幸近百年来之学风,趋新骛外,国学颇遭鄙弃;为学又贵专业,而不知天地之大美、学术之全体大用。以致一种宽易博大的治学之道,反而甚为寂寥。偶欲从事者,亦以为必是荆棘榛莽之绝学,非有绝大愿力,不敢问津。

其实此道甚为平易,圣贤教人,本来如此,今人自己犯糊涂罢了。我偶得师友护惜,于此稍有所见,自然就常想略述心得,接引同道,共窥国学之堂奥。十六七年前,与林安梧等人游贵州龙场驿,访阳明书院时,安梧即劝我好好聚生徒、讲国学,传此一路治学方法。

然传道之机缘一时尚未具备,倒是获得了创办南华、佛光两所大学之机会。当时集资募化的星云法师,与我本不相识,或问为何请我来办?老和尚都说:“仰慕他是个国学大师啊!”其实那时我也才三十多岁,长者厚意,闻之不无感奋,于是略依通识博雅之义,以为规摹。制礼作乐,讲习人文;并根于国学,发展出许多新学科。一时震动,以为能稍复古代书院之旧。社会观听,不无兴发,教育部亦迭有奖励。可见这个路子,在现代教育体系中仍然是能发展的;如何发展的制度规划,亦经试验而颇见实绩。在未来教育史上,当可有一席之地,较昔年北大清华之国学门更值得研究。因其规模意量皆较宏阔,制度性之建构也多多。

只不过,世缘变灭,人事不恒,我既卸任,其风或渐消歇。凡事之因人因势者,大都如此,本无足怪。但亦可看出这种制度性体制化的国学建构方向,似易实难。今人所办国学院,规模虽远不能跟我当年的建制相比,但也是难的;即或办成,亦未必久长。反不若仍如孔子般,随机讲学,辅以著述,也许还能形成较大的影响。

甲申以来,游居大陆,颇肆讲席。在北大及珠海联合国际学院所讲,已辑为《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在首都师大所讲,则写成了这本《国学入门》。当时是首师大开设了一个实验班,命我为新生讲说国学的入门之道,共十讲。后来在武汉大学,也讲了四讲。今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我又开了个新国学讲座,凡六讲。三者并起来,略有损益,作为“门径篇”。再加上一些评述民国初年国学家及国学教育的文章,作为“登堂篇”,合起来就成了此书。

因此,综合地说,写这本书,一方面是应时代之需,一方面是消个人之业。国学是我的缘,也是我的业;是我的力,一切力量的来源;也是我的愿,愿昌明

其学于天下。作此小书，略述门径，虽不足以宏阐整体国学之纲维与精神，起码为之尽了点心力，我自己是很欣慰的。

本书既然原是讲稿，便希望它真正达到接引的功能。门径篇凡十四章，分四个部分：（一）前三章，谈国学的名义、材料与方法。（二）四、五、六章，讲基本语文能力如何训练，介绍文字、声韵、训诂的知识与观念。（三）七、八、九、十章，说经史子集四部概况，及运用其文献之方法。（四）十一、十二、十三章，论儒道释三教之历史、内涵及研究法。十四章是补充之余论，亦是总说，谈治国学者的精神意态。

各章讲说，自然都只能针对各别领域，例如儒、道、释，或经、史、子、集；各章又各有主题，看来不甚统属。但我切望读者能通贯地看，时时想到我前面说的：治国学须有通识，亦在养成通识、成就通人。知识总是分门别类的，但读书的却是个人。人的知、情、意，必然整合为一体；其知性知觉知识，来源虽繁，门类虽别，亦仍是内在整合于人的。读书人焉能舍己徇物，依从外在知识分类而忘了自己呢？

学者又当知：博学之道，重在精神心态，不是知识上的不断相加。致知求学，亦非要做个技术性的学术工人。否则东谈一点西说一点，猎时名而昧大道，岂不哀哉？

以上十四章，介绍基本材料、知识与方法，是拆开来说，一项一项、一类一类。“登堂篇”倒过来，藉评述民国初叶国学运动之人物与教育，来看其中蕴涵之各种问题。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胡适、马一浮、陈寅恪诸人，或讲说国学，或开列相关书目，都声誉宏著，影响深远，是研习国学者重要的导师。但这些导师，这个如此说，那个如彼说，其持之有故之故、言之成理或不成理之理，到底何在，则不能不再略做些分梳、略有些辨正。通过这些讨论，治国学者方能算是登堂了，可以窥见堂奥。此后渐修，不难入室，得睹宫室之美矣。

本书为初学者说法，因此写得较为简饬，许多问题仅是略陈线索，未予展开。读者若欲进阶，则每一篇我都有相关之专论或专著可供参考，可以自行找来看。当然，为学贵自得：师傅领进门，修行在各人；孟子曰：“子归自求之，有余师矣。”诸君未来进境，岂我所能测度？我的这些言说，聊当津筏可也！

丙戌岁杪，写于燕京小西天隐居处

目 录

自 序	V
-----------	---

四 门径篇

第一章：名义	3
一、国学的兴起与消亡	3
二、国学复兴的意义	8
第二章：材料	13
一、文献及其保存	13
二、文献的整理	15
三、文献之学	17
第三章：方法	25
一、由资料到系统性思维	25
二、由方法到方法意识	29
第四章：语言	38
一、音的演变	38
二、词的特点	39
三、句的形态	42
四、语言与思维	46
第五章：文字	48
一、真正的文字	48
二、表意的体系	50
三、构造的原理	52
四、发明的历程	55
五、思想的历史	57
第六章：训诂	60
一、因言以明道	61

二、语言的分析	62
三、理解的迷失	65
四、反省的路途	68
第七章：经	72
一、经典化	72
二、圣典崇拜	73
三、经学历史	76
四、传经体制	79
五、经典不死	82
第八章：史	84
一、文字的书写	84
二、史官的传统	86
三、个人的著述	89
四、官史的发展	91
五、民史的现象	94
第九章：子	97
一、子学之变	97
二、先秦诸子	98
三、诸子之衰	100
四、研究诸子	102
五、解释历史	104
六、开放阅读	110
第十章：集	112
一、文集之兴	112
二、总集	114
三、别集	116
四、全集	119
五、丛书	121
第十一章：儒	123
一、儒家的起源	123
二、孔子的身份	124

三、儒学的分化	126
四、经生、文士与文吏	128
五、道学、经世与宗教	130
六、儒家型社会	133
第十二章：道	137
一、道教的来历	137
二、道教的性质	143
三、道教的研究	149
四、道教的资料	151
第十三章：佛	155
一、中国的和世界的佛教	155
二、佛教的理论	157
三、佛教的历史	161
四、佛教的资料	164
五、佛教之研究	166
第十四章：余论	170

▣ 登堂篇

第一章：国学之书目：胡适与梁启超	181
第二章：国学的讲说：康有为	185
一、口说	185
二、道教	186
三、佛教	189
四、西学	192
五、史地	194
六、天文	198
七、乐律	201
八、余论	203
第三章：国学的讲说：章太炎	206

一、章太炎所说之国学	206
二、章太炎的佛家宗旨	208
三、章氏国学之商兑	211
第四章：国学的讲说：马一浮	214
一、马一浮的六艺之学	214
二、马一浮学术之特点	215
三、马一浮援佛论儒之风格	219
四、马氏国学的宗儒旨趣	223
第五章：国学的教育：以清华国学院为例	227

甲 门径篇

第一章：名义

一、国学的兴起与消亡

国学这个词，指的是中国传统的学问。但这个词本身却恰好不是传统的东西，而是清朝末年才出现的新事物。

当时讲国学，有两个脉络。一条脉络发白朝堂，一条生于草莽。

（一）

发白朝堂的，是因清光绪末年才开始推动新式教育体制，废科举、立学堂，而这个改革活动与其说是政府戮力革新以救亡图存，不如说是社会总体思想的倾向使然。故影响中国达千年以上的科举制度，及与之相关联的教育体系，才能一夕崩溃，幡然故途。但亦因如此，新式学堂从一开始就显示了它的反传统性：要教习西学，以富国强兵。学堂的教学内容，乃因而皆以西学为主。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学部所拟《奏定学堂章程》，就提到当时社会上已弥漫着废经灭古的言论：“无识之徒喜新灭古，乐放纵而恶闲检，唯恐经书一日不废。”针对这种风气，政府觉得应该在新式教育中仍保留中国学问的地位，希望学生仍要读经。

这就是当时讲国学的第一条脉络。想在西学冲击之下，读点经书，“以免抛弃中学根底”（《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

此时虽未提出“国学”一词，但谓：“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把经学当成是立国之根本。认为若大家都不读经，都不晓得这个根本，“中国必不可能立国矣”（《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显然是把经学视为中国根本之学了。

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四川中书科中书董清骏便提议设立国学研究所，“以保存国学……冀一线之延，为将来发达之种子，庶几有光大之一日也”（《四川提学使方旭致叙永厅劝学所札》）。

朝堂之议论与政策如此，草莽之士的见解又如何呢？

(二)

1902年梁启超首先介绍了日本的国粹主义,他致书康有为说:“日本当明治初元,亦以破坏为事。至近年然后保存国粹之义起。”接着他又写了《日本国粹主义与欧化主义之消长》一文,介绍了国粹主义者:“谓保存本国固有之精神,不肯与外国强同。如就国家而论,必言天皇万事一系;就社会论,必言和服矮屋不可废,男女不可平权等类。”(《读书汇编》第五期)随后,黄节亦在《政议通报》发表了《国粹保护主义》。除了介绍,也有批评,认为日本的国粹主义是封闭保守的,只知“我国所有之谓国粹”,不知吸收外国文化为我所用也是国粹。故他所说的国粹保存主义,乃是开放性的取精用宏,有萃取集粹之意,故曰:“本我国之所有而适宜者焉,固国粹也。取外国之宜于我国而吾师以行焉者,亦国粹也。”

黄节这种意见,可以代表当时革命党人的国学观。因为革命党人黄节、邓实、章太炎、刘师培等人于1905年在上海成立的国学保存会,就同时发行着《国粹学报》。可是其提倡国学,并不尽同于清政府是想藉提倡国学以减少、降低,甚或平抑欧化之冲击。因此,当时许宁微就在《国粹学报》上发表了一篇《论国粹无阻于欧化》的文章,认为欧化不能貌袭或橘逾淮而为枳式的,只有把自己田亩耕垦好了,外来的种子才能在这块土地上结出好果子来。

革命党人国学观之不同于清廷者,不惟于是。清廷的国学观,用张之洞的话来说,重点在国不在学:“保国、保种、保教,合为一心,是谓同心。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因为:“国不威则教不循,国不盛则种不尊……保国之外,安有所谓保教保种之术哉?”(《劝学篇上·同心第一》)可见保教之目的在于保国。革命党人也主张保国,但这个“国”的含义却与之不同。在他们看来,“国”应该是与“君”要分开的。所以“国学”应当是一个国家的立国精神:“国粹者,一国精神所寄也。其谓学,本之历史,因乎政俗,齐乎人心之所同,而实为立国之根本源泉也。”(《国粹学报·论国粹无阻于欧化》)故这个国学并不是君学。

依他们看,中国自秦汉以降,都只是君学,国学已亡,故国亦不国。所以黄节说:“秦皇汉武之立学也,吾以见专制之剧焉。专制之统一,而不国、而不学,殆数千年。”(《国粹学报·国学真论》,1907年第2期)凡以为忠君即是爱国,以为功名利禄即是国学,不知考郡国之利病、哀生民之憔悴者,都是君学、伪儒,都不是国学。换言之,革命党人之国学观,是具有反君主专制之强烈批判意识的。

正因为如此，故其所谓国学，内涵也就不再指经学。经学是儒家一家之学，且是汉代帝王独尊儒术后才形成了那么崇高的地位。革命党人要推翻君主专制，自亦不再宗经；其所欲取法者，乃是秦汉专制王权尚未建立以前，九流十家争鸣的那种学问。

此即称为复兴古学。邓实《古学复兴论》说：“吾国周秦之际，实为学术极盛之时代，百家诸子争以学术鸣。”道光咸同以后诸子学渐盛之风气，在他看，就反映了国人已由君学回归国学且与西学逐渐合流的趋向：“诸子学而西来之学，其相因缘而并兴。”

古学的内涵，便因此是指诸子学，儒家则只是诸子学中的一支。

复兴古学之另一意念，则是把这种风气或趋向比拟于欧洲的“文艺复兴”。邓实把周秦诸子比拟为希腊七哲，把秦始皇焚书比为土耳其焚毁罗马图籍，把汉武帝罢黜百家比为欧洲封建神学之束缚，而说：“十五世纪为欧洲古学复兴之世。而二十世纪，则为亚洲古学复兴之世。”（《古学复兴论》）欧洲文艺复兴时，不但由学说上追踪古希腊罗马，也收集整理流散亡佚之古籍，邓实他们也在国学保存会底下设有藏书楼，收搜丛残，然后刊刻出版，因此影响宏远。

国学保存会此等“以复古为解放”的行动，显示了草莽的国学观。国学，在其语脉中又名国粹、古学。具体内容则是具批判精神、反封建君主专制的诸子学。革命党人以此振起民气、激扬国魂，最终战胜了朝廷，启建民国。

（三）

但国学运动并未因此而告终。一方面，沿续国学保存会这种思路的，仍在继续发展，例如，1912年高旭、高燮、柳亚子、李叔同、胡朴安等人就又成立了国学商兑会。商兑什么呢？原来在晚清复兴古学阶段，重点在于复兴。因此缚佚钩沉，要把九流十家久遭沉埋的学说与著作通通找出来复兴一番。可是老东西渐渐钩稽出来以后，就逐渐产生了选择的问题。到底九流十家、儒道墨法名兵农阴阳，什么才是今日中国应该倚以为国魂的？什么才是现在我们所需要的？这就不能不有所抉择，不能不好好商兑商兑了。这种国学商兑之风，不仅表现于国学商兑会这一个团体，事实上也是民国初年很广泛的一种思路。例如有一阵大兴墨子热，觉得墨子比孔子更符合现代之需，便是此风之影响。

另一方面，古学复兴运动中激进的一面也在深化。例如当时说中国几千年来都是君学，都是伪学，都应打倒；或把孔学儒学跟专制统治挂钩，一并批

判,就逐渐带生了对儒学与传统的整体拒斥态度,出现了整体性反传统的浪潮。国学商兑会所编《国学丛选》第一集收有高旭《答周仲穆书》就说:“孔学实为专制之学,孔子一生教人唯尊君而已”,主张废孔用墨。且说:“鄙人十年前所抱宗旨即如是,至今未变。近见蔡子民先生亦有此观念。”可见五四运动所倡行的那种反传统思潮,要打倒孔家店等等,与古学复兴运动确实有其内在的渊源。

但五四运动是极复杂的。从某方面说,它反传统,要迎接德先生与赛先生,肇启了全盘西化之说,要向西方去寻找真理,令国人对旧学弃若弊屣。但像胡适这些人自己评价五四时,却未必如此看,反而说五四是中国的第一次文艺复兴。胡适英文专著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中国文艺复兴》) 即指出:“中国第一次文艺复兴是禅宗之出现;第二次是宋代新儒学取代了中世纪宗教;第三次是明清戏曲与章回小说兴起,对爱情与人间生活乐趣坦然颂扬;第四次是清代朴学反抗理学,在文献上带来重视证据的新方法;第五次就是五四。”

由“文艺复兴”这个角度看,五四运动所带给文化界学术界的,就不是对中国学术文化的扬弃,而相反地是要发扬。如何发扬呢?延续第四次文艺复兴之方法,即清儒在文献上带来的新证据之方法,结合西方的科学方法,来对中国学术文化传统仔细清理一番。

此说后来凝结为一句口号叫做:“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什么叫国故呢?那就是中国从前的历史文化传统。著名的国学家章太炎曾写过一部《国故论衡》,表明了此时学人之基本想法,乃是要对国故好好讨论并衡量其价值。1925年清华设立研究院时,在章程中规定:“先设国学一科,其内容约为中国语言、历史、文学、哲学等。”研究院主任吴宓又补充曰:“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此与稍早胡适起草的北大《国学季刊·发刊词》把“国学”、“国故”定义为:“研究中国过去历史文化的学问”相似,都是以文化史为国故国学之具体内容的。无怪乎东南大学《史地学报》在介绍北大国学时会说:“在今日情形之下,吾人谓北大国学研究所为国史研究之中心,殆无不可也。”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了解胡适所开列的“国学最低限度书目”为何会把《三侠五义》、《九命奇冤》等都列入其中。它们既非经学,亦非诸子学,只因国学在此时已是“研究中国过去历史文化的学问”(《国学季刊·发刊词》),故才得以厕身其中。

当时除北大、燕大、清华、厦门大学等校普遍设立国学研究所外,中学也设

有国学科目。钱穆的《国学概论》就是他在无锡教中学时所编之讲义,可见一时蔚然成风之国学研治风气。

(四)

但把国学视为整体历史文化研究,范围毕竟太大了,陈独秀就批评:“国学本是含混糊涂不成一个名词。当今所谓国学大家,胡适之所长是哲学史;章太炎所长是历史和文字声韵学;罗叔蕴所长是金石考古学;王静安所长是文学。除了这些学问之外,我们实在不明白什么是国学。”顾颉刚则解释说国学的范围太大,是因中国各学科都不发达,所以研究国学的人什么都要研究。倘若“中国各方面都有人去研究了,那么我们的范围就可缩小,我们就可纯粹研究狭义的历史”。

这些批评表示当时已有一种西方现代学科分化的观念。依这个观念看,国学也者,主要是史学,但又往往包涉太广,因此范围辽阔、义界不明。把这个观念明确发挥出来,且奠为制度,形成国学之变革者,则是傅斯年。

“整理国故”一词最早的使用就是傅斯年,但自1922年起就因“见到中国之大兴国学”,便生了“绝国故”之念。这当然只是因心理上反对浮器,可是心理产生行动,在他办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时,便明建旗鼓反对国学国故,谓国学之内容“不外文学声韵之考订、历史事实之考证,前者即所谓语言学,后者即所谓史学。此外如中国专有之材料,亦皆有专科治之”(《与朱家骅函》。又参见《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也就是说,国学应该拆解开来,论文学的归入文学;论历史的归入史学科系;论政治、经济、社会科技什么的也各应放入专门的学科中去研究。“国学”的那个“国”字,本来是有保国、保种、保教之神圣意涵,也消解了,只是指中国的材料罢了。治地质学的人,大可以拿着中国地质资料去研究,说这就是中国地质学。但中国地质学,与欧洲地质学并无本质之不同,仍是地质学之一环,只是材料主要用中国的罢了。地质学如此,中国经济学、中国政治学等又何独不然?于是一个普遍的学术分科的体系,就把原先基于与欧西学问相对比而形成的国学概念彻底拆卸了。国学也迅即在随后的学术分科中被拆开,归入各个科系。1949年后,大陆沿袭了这种观念并扩大了学术分科,且分得极为琐细。例如文史哲不但分了家,文学中还要分古代、近代、现代、当代等。那种综合的、统包的大国学概念,遂在中国绝了踪迹,距其兴起不过五十年左右。